

Lost boat
ferry

迷舟摆渡

——陈培浩诗歌评论集

陈培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Lost boat
L ferry

迷舟摆渡

——陈培浩诗歌评论集

陈培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舟摆渡：陈培浩诗歌评论集/陈培浩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8

(韩山诗歌文丛)

ISBN 978-7-104-03073-7

I. 迷… II. 陈…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2668 号

迷舟摆渡 陈培浩 著

责任编辑：刘建芳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54.25 印张

字 数：1146 千

版 次：2009 年 8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3073-7

本册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何谓诗人

——《韩山诗歌文丛》第一辑总序

■ 黄景忠

何谓诗人，常人与诗人有何区别？在我看来，诗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常人是安于日常的生活，诗人呢？他们是既过着日常的生活，又总想从日常生活中挣脱出来，把目光投向为生存而忙碌的功利化的生活空间之外。诗人的特质在于他的精神的超越性，或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不，期望着诗意栖居的人，应超越有限而仰望神圣，“此‘仰望’穿越‘向上’而直抵天穹，然则同时仍滞留在‘下面’，在大地上。‘仰望’跨越了天穹与大地‘之间’。这‘之间’是赠给人之栖居的。”（《……人诗意地栖居》）也就是说，常人总是羁留在大地上，而诗人，必得超出世俗的生存方式，向“神性”站出自身：

一切都在安睡，你需要赶在太阳前面
进入森林，找一处干净的入口
把你的失望，哀伤，残忍，傲慢以及怯懦
统统关起来，永远锁上
像快乐的植物那样

从土地上慢慢抵近天空

——泽平《我们的时光》

不要因为这里采用“神圣”、“神性”的表达而把诗人的超越看作宗教的超越，虽然都是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而宗教的超越追求的是人与神的合一，诗人的超越是追求人与世界的合一。人本来是扎根于世界万事万物之中，与万事万物融为一体的，这合一的整体是人类的家园。但是，自从发展了自我意识，发展了工具理性，人就把他人及他物当成对象加以认识、占有和利用，这种功利化的生存方式让人只盯住眼前在场的东西，而忽略了隐蔽在它背后不在场的无穷无尽的东西结合而成的无限的整体，存在被遮蔽了。一方面，人的欲望固然得到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自然被割裂开来，人失去了万物一体的庇护，失去了家园。这个时候，就需要诗人站出来，超越功利化的生存方式，以诗性的光芒敞亮存在，让在场与不在场，有限的人与无限的宇宙万物融合为一。中国古代的诗歌，常常表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从中往往能够体味到人与世界合一所引发的生命的感动。而现代诗，表现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疏离的迷惘和焦虑，以及重返家园的思慕。

这个世界需要诗人的吟唱，大学尤其如此。大学不仅要培养人在生活中生存及竞争的能力，同时要赋予人精神超越的气质，这就需要艺术尤其是诗歌的滋养。幸运的是，我生活着、工作着的韩师，就有着诗歌创作的传统。昔年饶宗颐、詹安泰等大家的旧体诗词创作自不必说，九十年代之后群星闪烁的校园诗人的诗创作，即或是放在整个中国校园文学当中也散发着夺目的光辉。也正是有感于此，

去年编定《韩师诗歌十五年》之后，一直在构想为创作上已形成风格的韩园诗人们编辑一套诗歌丛书。现在，终于欣喜地看着 10 本诗及诗论集摆在眼前。这 10 位诗人，除了礼孩，都是从韩园中走出来的，他们或者在学期间就已进入了诗创作的黄金期，或者是在毕业后诗歌创作或诗歌研究才日臻成熟。他们的创作，自然是各具个性的，只是由于我缺乏诗的天赋，又对诗歌缺乏研究，很难对他们的创作作任何分析和评价。但是，我能够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具有诗性之人，都是能向“神性”站出自身，能以诗性光辉敞亮存在的人，就如黄昏在《停电》中所吟唱的——

我尽力为眼前这些事物
打开连接外部世界的通道

我相信每一件物体的内心
都蓄满了光辉
他们每时每刻
都在等待与时光的交合……

2009 年 8 月 20 日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批评家。)

自序

那些本真生命的寻找者

为自己的诗歌评论集写点什么，为自己的出场吆喝几声。我跟诗歌的缘分缔结于中学时代，那时热爱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大学时代出于对诗的敬畏，我不敢加入诗社。其后，多次机缘巧合，跟诗歌再续前缘。很久以后，重新回首，我觉得诗歌一直有一种气质吸引着我：那就是对超越性生活的追求。

因为诗歌，我发现了那么多在默默地写作的人，他们不做作、不夸张，他们的写作不为名利，不为职称。写作在他们那里，那么纯粹地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倾诉。这个暑假，我和我的朋友阿兽有过一个倾谈，阿兽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失败与伟大》。阿兽用嵇康的故事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他说：知识分子住不了城市，还不了乡，又归隐不得山林，知识分子永远在无家的漂泊中。现代知识分子的失乡和还乡，当然不是阿兽的发现。但是阿兽写作时的状态却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部他在大学时就一直构思积累素材的小说在他毕业后第一年动笔，他剃了光头、蓄了胡子、关了手机，每天佛珠在手，黄酒三杯，进

人佯狂的状态后就奋笔疾书，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近三十万字的小说。

我至今没有读过阿兽的长篇，他说依然在改，我在想他该不是要用一生来写这部小说吧。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有一种信念，某种别人视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却要用尽全力去完成。这是一个诗人吧，我想这就是诗人，或者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诗人。在这本书中，我不再将诗人看作一种职业，我也不将诗人看成某种可以一以贯之的身份或能力。我认为诗人是一种状态，是人用审美创造去超越庸常状态的一种努力。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创造，海德格尔早就将诗人视为“期望诗意栖居的人”，视为超越有限而仰望神圣的人。

诗人不是一种永久的身份，诗人的存在尖锐地提示着这个社会本真生存和庸常生存的对立。所以，诗人是这样一些在本真和庸常的状态中来回的人，由于对本真状态的追寻，他们的诗句常给我们的心灵移来整个天空的星光；他们也常常面对庸常状态、世俗生活秩序的规训，所以能够长久地保持审视的、审美的诗心，并因为对庸常状态的有意疏离而保持长久的写作生命力的人是多么的少。写作者心灵和庸常状态之间的距离，很容易被诗歌所丈量。一个心灵中外在秩序的投射渐多的写作者，渐渐会发现他难以面对诗歌，并最终导致诗歌“失语”。（当然，诗心的沦丧并非诗歌失语的唯一原因）在我看来，诗歌失语是一个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上世纪建国后，曾有一批诗人其写作认同难以和新的写作范式和解，并最终导致诗歌失

语。但是今天，一大批曾热爱着诗歌的人，他们在渐渐地摸索到写作的窍门的时候，却开始丧失了诗歌写作的热情。这提示我们，诗歌失语绝不仅仅跟政治相关。基于此，我对身边的一批诗人的写作进行考察，我并不从写作成就方面去走近他们，我更希望从他们的文本中去把握他们的困惑，把握他们写作停滞的原因以及自我超越的经验。

我所关注的这些诗人，很多并未成名，毋宁说他们是一群虔诚的诗歌学徒，他们为了寻找心灵的本真状态而选择了诗歌，而他们在写作到了一定的时期后也进入了写作的彷徨期。因此，我认为他们都处在一种迷舟摆渡的状态，他们的心灵和语言在迈向诗歌对岸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险阻，是吸引我去探寻的秘密。

这里，我要说说我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一点看法。我要先提到周瓛的《文学批评如何对诗歌说话》，周瓛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批评如何面对文学创作发言，这是任何一个批评家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周瓛这里特别指的是诗歌。

周瓛表明了对三种盛行的诗歌批评方法的不信任，首先是术语思潮概括的批评方法。她说：“我从8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读书时，就接触到一些常见的概念，如新诗潮、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诗、后新诗潮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直到90年代还在一种内在的相关性中替嬗与衍生着。一度时期，我必须借助这些概念来理解当代诗歌发展的整体面貌、诗坛的格局分布以及不同的潮流消长等等

情况。”但是，这种方法也是常常捉襟见肘，牵强附会，对于一个浪潮的任何一种描述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遮蔽那些无法被概括的“另类”。

这里，我突然想起韩东在《奇迹与根据》（《诗刊》，1988年第3期）中所写：“诗歌运动被描述出一种思潮，也只有在这一个角度上它能够被理解。对于诗歌运动这种阶段性的理解越是深刻，其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就越是‘深刻’地被忽略了。”韩东的这种思考已经越来越被研究者所体认，周瓛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周瓛对于大量运用新潮文学理论，以牺牲文本的审美特质来完成宏大的理论建构的诗歌研究方式也表达了不满，这种研究运用意象理论、符号学理论、不完备的新批评理论等等，作为阐释诗歌文本的基本视角和方法，“我读这些书总觉得沮丧，觉得它们为我提供了理解诗歌的方法，一方面无法帮助我区分诗歌的好坏，另一方面更败坏了我写作诗歌的兴致。”

周瓛对于90年代以来大量涌现的诗人批评也表达了“犹疑”。一方面，“我个人对诗歌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些批评文字。但是，这种本可以使当代诗歌研究迈向纵深的批评现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滑稽而有趣的问题。”比如“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还比如“后口语写作”、“下半身写作”这些提法在周瓛看来观念的根基就相当的单薄、脆弱。

周瓛因而提出她自己愿意采用的诗歌批评方法：

一是做具体的诗人研究。

二是立足于现代汉语语言的探索意识来理解和批评当代诗歌的内在走向和阅读具体的诗歌文本。归根结底，诗歌是一门独具语言魅力的艺术，从写作的角度看，一个汉语诗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现代汉语最大限度的实验工作。

第三点，批评应回到对现代诗歌写作的动力机制和释读方式相结合的探索意识中来。

周瓛描述了当代诗歌批评所面对的共同的问题，但她的解决方法就未必每个人都会采用。在诗歌价值如此混乱的时代，每一个批评家诗歌标准的确立，无疑就是一种诗歌价值认同的确定。如果我们也看看臧棣的诗歌批评观，我们会发现他们，或者说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诗人（这个说法有区域本质主义之嫌），他们对于诗歌写作的认同危机是在语言探索中解决的。臧棣在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时候说，人们总是问我有什么危机，我没有危机，我就是写作。

在语言探索中寻找诗歌写作的认同，这并不能被视为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它确乎是这个时代照亮诗人内心创作热情的另一个话语灯具。但问题是，它并不能被视为是诗歌写作的唯一出路。当代的诗人，依然可以保存从语言这个角度之外突围，并探寻价值重建问题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语言探索（所谓写诗写得很专业，在诗歌写作中尝试各种新的技巧、拓展诗歌语言的可能性边界）对于诗歌写作当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诗歌语言探索的迷恋，其中也自有诗心在。但是我似乎更加认同世宾等人所倡导的完整性理论，即诗歌是对人类生存不完整状态的反抗。诗

人，那些本真生命的追寻者，他们的目光要穿透各种霸权机制而发出智慧的质询，他们的心灵要穿越各种庸常的遮蔽而发出澄明自在之光，他们的语言必然因此而超越于日常性的语言而透露出诗性的光辉。我认同周瓛从诗人个案做起的研究策略，但我似乎更加愿意去关注诗人心灵的上升与挫败，诗人对完整性的追求以及被黑暗淹没的挣扎。能够如藏棣一样在语言的尖端独舞的诗人并不多，而默默无声地在寻找着生命和语言的诗性的诗人却千千万万，我钦佩那些优秀诗人的语言创造，但是我却只能和大量普普通通的写诗者，默默地企图用诗咬开黑暗的一角，并借此向本真的生活探出自己的头。

2009-9-1

目录

自序：那些本真生命的寻找者	1
绪论：身份危机、诗歌失语和写作认同	1
第一章 形式实践和待解的精神叙事	21
第一节 想象力和精神支点：傻正诗歌的语言气质及其待解的问题	22
第二节 圆满的危机：江南侠客陈仁凯	30
第三节 诗歌写作的“中年危机”：从诗到散文的杜国光	40
第二章 青春写作的耐力危机	48
第一节 情感叙事和青春写作的桃花岛：泽平诗歌的一种观察	49
第二节 流落的王子不及物的诗：杜伟民诗歌解读	64
第三章 诗歌写作的“路径依赖”	76
第一节 底层写作和诗人身份的转换：郑小琼诗歌的身份及视角	77
第二节 所有的出走，都为了归来：浅论郑子龙的诗歌特色及“失语”	103
第三节 质疑是现代诗人的重要素质：金森峰诗歌的古典经验及其衍解的问题	125

第四章 精神还乡和焦虑消解	139
第一节 一个灵魂安居者的精神路径：黄礼孩诗 歌的宗教情怀和精神价值	139
第二节 黄昏诗歌的自然情怀和焦虑消解机制	161
第三节 挖掘虚无的“出生地”：黄金明《洞穴》 的精神还乡和启示	181
第四节 蝴蝶和牛虻：朵渔诗歌写作的精神认同	191
结语：摆脱固化的写作认同	208
主要参考书目	218
附录：	
庞德意象派诗歌的现代性内涵	220
文本细读和文化批判的缝隙	231
——郑愁予《错误》的女性主义解读	
后 记	244

绪论：身份危机、诗歌失语和写作认同

一、身份变迁与危机：二十世纪文学无法摆脱的幽灵

身份与写作之间的纠缠，密集地浮现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个阶段，并因此成为不断被聚焦的话题。当学者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探讨现代文学时，首先发现的是写作者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身份向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变。因此“认识现代诗人的自我形象，我们应注意两个构成因素，一、现代汉诗不再具备古典诗在传统社会结构里的相关性；二、现代读者对现代汉诗所代表的新文学典范的陌生感。在消极意义上，诗人常自我认同为‘零余人’。”^[1]古代诗人是士大夫社会身份之外的另一层文化身份，而到了现代，诗人则在“流放与超越”中建构起“作为悲剧英雄”^[2]的新知识分子形象。

[1] 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第3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2] 见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第二章，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建立起来的启蒙传统在四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格局中产生了最重大的变化，钱理群先生在分析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指出“正是这种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与文艺的‘彻底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最根本的特征。”“由此带来的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变化，即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完全不同的所谓‘新型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是以‘写作’换取生活资料的自由职业者，而都成了‘公家人’，即国家干部，直接隶属于一个国家部门，一方面得到全面的保障，另一面则对所在的单位形成了某种依附关系。”^[1]

四十年代开始表现出来的作家身份变化在建国之后更为明显、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来，它对诗人们写作的改变是彻底而触目惊心的，“面对当代对于新诗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是否继续写作，接着是如何写，是那些已有多年写作经历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2]面对新规范如何写作，其内在问题是新规范所给出的公家人身份和给定的表述空间、表述方式和诗人们在五四传统中形成的个性自由的创作传统之间的抵牾和撕裂。其结果，不管是主动变身操持新的写作规则成为典范的郭沫若，还是无法放弃原有的诗

[1] 钱理群：《“新的小说的诞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三卷第6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歌认同，在新的写作规范中失语的诗人们，（如“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他们都因此丧失了按照原有的诗歌认同写作作品的可能性。而在这个过程中，更多诗人是在新规范和旧认同之间努力挣扎，努力寻找突破，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却常常被淹没在后人误解的目光中。

胡续冬在《1957年穆旦的短暂“再现”》^[1]这篇文章中对1957年穆旦作品的短暂“再现”进行重新审视，想要挑战一种缺乏历史感的想象。在此之前，诗人黄灿然曾经认为：《穆旦诗全集》一书所收的穆旦50年代的诗歌“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了出来”，它们“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把诗歌当成工具”，并指出写作日期标注为1951年的两首诗（《美国怎么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发表在1957年的杂志上表明了作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反省力和判断力。（“写了几年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黄灿然的结论是：从50年代的写作来看，穆旦“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

胡续冬认为，进入十七年作品的一个前提是“必须避免拿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前苏联、东欧的流亡、准流亡作家的写作伦理和立场作为标尺，这样很容易得出‘反抗不纯粹、不彻底’的结论。”并因而简化了我们对诗人作品及其自身的历史情景复杂性的认识。他从作品发表的背

[1] 胡续冬，《1957年穆旦的短暂“再现”》，《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张桃洲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